

绪 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引入到我国的企业管理之中。时至今日，人们对泰勒、韦伯、梅奥、西蒙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管理思想已耳熟能详，这无疑是我国企业管理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国门打开之后，我们也同样看到，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渊源的国家，其管理的成效与欧美国家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显示出更加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日本之所以能够胆粗气壮地向美国说“NO！”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富有效率的管理成为日本企业敢于与美国企业进行竞争的强大支撑。另一个颇具典型的例子是，海湾战争时，用高度现代化军事装备武装起来的美国军队，把中国的《孙子兵法》作为必备教材。在海湾战争的最后决战中，美军统帅充分运用了“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等这些载诸于《孙子兵法》的谋略，加上高度现代化的装备，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些情况表明，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思想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在当代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为之自豪，同时，也为近年来泛起的民族虚无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概排斥、一概否定的思潮，以及“数典忘祖”的行为感到痛心。翻开中华文化千百年来浩如烟海的典籍，就可以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蕴藏着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发掘这一宝库，吸取其精华，对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如何把中国古代兵法的管理思想、

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精华，应用于现代化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重要课题。

第一节 中国兵法与现代商战

中国的改革开放，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下文中简称“传统体制”）排斥商品生产、抑制竞争的僵化、呆滞的局面，使以竞争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机制长入企业的运行过程，并逐渐对企业的行为取向起主导作用。进入 90 年代，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目标模式。随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又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内容，中国国有企业（按：在本书中如无特别说明，均称为“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进入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

“商场如战场”。这句话，十分确切地描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就是各个竞争主体之间进行的商战。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必须认识和掌握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认识和掌握现代市场竞争的特征，或者说，认识和掌握现代商战的特征和运行规律，使自己的行为适应这些特征和运行规律，才能在现代商战中获胜。

竞争无疑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早期的市场经济竞争有着重要的区别。

其一，现代市场竞争是综合实力的竞争。所谓综合实力，就企业而言，在内部取决于企业全部生产要素综合配置的质量和水平，它直接体现为企业的生产效率；在外部，则取决于企业的产品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程度，它体现为企业的经营效率。这两方面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一个企业的综合实力，即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而在早期的市场经济中，单项的生产要素的优势，往往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决定

性因素。因而在早期的市场经济中，由资源垄断、技术垄断而获得市场垄断的现象比较常见。这种现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虽然还存在，但其范围和影响已大大缩小。

其二，现代市场竞争是企业谋略的竞争。在早期的市场经济中，企业还带有小生产的烙印，其生产经营规模狭小，具有自发性、盲目性，且以经验管理为主；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生产社会化水平的大提高，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多样化，物质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市场的瞬息万变，等等，要求企业领导必须统揽全局，在对各种因素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经营决策。这样，经营谋略就成为关系到企业前途和命运的重要条件。

其三，现代市场竞争是规范、有序的文明竞争。早期的市场经济，经历了充满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的原始积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市场主体缺乏规范的竞争准则，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则以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为目的。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制度规范，有序化已逐步成为现代市场竞争的重要特征。满足人的需要与企业利润最大化取向，客观上趋于有机结合和统一，使企业管理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即管理的重心已从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近年来，更从重“管”轻“理”转变为以“理”为主。由此形成了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企业管理新思想、新方法、新模式，这就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企业文化建设。由于不同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形成了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管理风格，因而就形成了企业文化的无形竞争。与有形的产品、技术竞争相比，这种以文化为内核的无形竞争对企业的影响更为深刻，同时，也把现代市场竞争提高到与现代文明相联系的新层次。

现代市场竞争的这些特征，反映了现代商战在范围上不断扩展，层次上不断深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对作为商战参与者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企业越来越表现出与军队的战斗单元相类似的特征；同时，现代商战的纵横捭阖，也与战场上进退攻守异曲同工。这

些，都为把兵法应用于现代商战提供了广阔的领域。也正是基于此，国内外许多企业家都把兵法中的谋略和用兵之道融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这种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思想的精华与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结合起来的作法，在近年来国内外的企业管理中已创造出不少成功的范例。以被誉为世界上成就最高的兵法著作的《孙子兵法》为例，它不仅对现代战争仍有参考和借鉴价值，而且也是企业进行商战的谋略和策略的宝库。日本企业把《孙子兵法》用于企业管理和国际商战，使其能够在强手如林的国际市场中称雄；美国把《孙子兵法》列为培训经营管理人材的必修课，以期重建美国企业的优势。这些都说明，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兵法，已被视为现代商战中致胜的法宝。

第二节 中国兵法：现代企业文化的传统渊源

如前所述，以文化为内核的无形竞争已成为现代市场竞争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的直接体现，就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崛起。

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中长期形成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观、作风、传统习惯和行为规范等的统称”（《经济大辞典》，于光远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800页）。

从企业文化的内涵可以看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的生成和发展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因为，一切文化现象都依存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结构。传统文化也必然成为企业文化重要的渊源。

在当今世界，不同的传统文化衍生出了3个类型的工业文明。即以基督教新教的伦理精神为基础的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源于拜占庭基督教神学精神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工业文明；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核心的东亚国家工业文明。这里不拟对这3种工业文明进行优劣比较，只是想指出，日本从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崛

起 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走上新兴工业化的发展之路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都显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长入现代工业文明之后所形成的强大的经济凝聚力和扩张力。8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区。人们在研究这一现象时，都把中华文化的精髓视为一个重要的根源。国际管理学界则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古代管理思想，给予高度重视，进行发掘和研究。其中 对中国兵法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管理方法的研究，已成为当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 自 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了企业文化建设的热潮。从时序上看，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并不滞后。但是，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如何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却存在着一些偏颇。一类偏颇是把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一概否定，一概排斥。在改革开放初期 欧美和日本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被大量引入。这些与现代工业文明相联系的文化形态的引入，的确给长期束缚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企业进行管理改革，带来了新的因素，但是，一些人却忽视了管理思想和风格的文化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妄自菲薄，以致使一些引进的管理方法，或者半途而废，或者流于形式，从而削弱了这些管理方法的应用效果。例如，80年代初风行一时的全面质量管理的引进，在相当一部分企业中，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效，以致发展到产品质量问题成为社会一大“公害”的地步。

另一类偏颇则是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时，对其构成缺乏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近年来，国内管理学界，包括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日益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对铸造企业的凝聚力，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但在理论和实践中，一些人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构缺乏全面的认识，存在着扬此抑彼的倾向。例如，对儒家思想研究得多，而对法家、兵家、墨家等思想研究得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形成了“独尊儒术”的现象。

应该说，第一种偏颇实际上是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其谬误是明显的。第二种偏颇虽然认识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必要性，但在如何认识、怎样继承等方面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必然对我们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广博的体系。源于先秦诸子的各种流派，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唯有儒家思想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和弘扬，在治国、治人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和方法体系，而其他流派，则因种种原因，大部分被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例如法家讲耕战刑赏，却为“治世”所不容；墨家讲技艺劳作，却被视为“奇技淫巧”而罢黜；兵家讲攻伐谋略，却因统治者惧怕其为“犯上作乱”者所掌握而屡遭禁毁。尽管如此，这些流派仍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过去特定的历史时期，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些思想和方法，也为儒家所吸收，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在今天，我们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时，应当博采众家之长，丰富和完善企业文化的基础。

以兵家为例，其渊源可溯自三代以上，在秦以前的王朝更替、诸侯攻伐的战争中，就培育了一批著名的军事家，如姜尚、管仲、孙武、孙臆等。秦汉以后，军事家历朝历代皆有名人，其中既有以文治武功而著称的帝王，如秦始皇、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清康熙帝等，也有辅佐帝王成功立业的著名将相，如汉之张良、韩信，三国之诸葛亮，唐之李靖、郭子仪，宋之岳飞，明之刘伯温、戚继光，清之曾国藩、左宗棠等等。中国历代军事家的军事实践及其军事著述，构成了中国兵法体系。中国兵法的源远流长，及其实践的丰富和理论的完整，为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难以望其项背。

中国兵法载诸于古代典籍，其卷帙浩繁，难以数计。大体可分为 3 类：一类是兵家专著。《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六韬》以及诸葛亮的《将苑》等，均属此类。据粗略统计，中国古代兵法著述约 1300 多种，其中世传兵法著述有 200 多种。第二类是历代王朝的政书、官修

史书中的军事部分。主要记载了历代王朝的“文治武功”见诸二十四史。第三类是古代的文史家论兵。这类著述比较分散，也不仅限于兵家。即使在儒家典籍中，也有论兵的内容。总的来看，中国古代兵法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战史、谋略、阵法、阵图、军制、兵策、天文、地理、气候、疆防、将帅、后勤等，最集中地体现了人类关于战略、策略等方面的智慧和军事组织、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之精华。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伦理，讲秩序，讲守成，兵家则讲进取，讲力量的对比，讲取胜谋略的制定与力量的组织，以兵法的经典传世之作《孙子兵法》为例，谋略思想是其主线。《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始计》、《谋攻》、《兵势》、《九地》等篇章都主要是讲谋略的。《孙子兵法》特别强调“庙算”，即谋略的重要性，指出事先筹划、计算，是制定谋略的前提。在制定谋略时，必须综合分析各种相关因素，即“经五事”、“校七计”。所谓“经五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分析政治形势和天时、地利、将帅才能、组织编制。所谓“校七计”，就是综合判断决定战争胜负的七大因素，即对交战的竞争对手双方最高决策者的能力，指挥者的才干，所处的形势和地位，管理组织水平，实力的强弱，队伍的素质，激励和约束机制等，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分析，并由此来判断胜负。不仅如此，《孙子兵法》还特别强调审时度势，知彼知己，发挥主观能动性，铸造队伍的士气与凝聚力，以寻求制胜之道。从这些方面看，兵家思想在管理决策与组织方面，能够为企业进行现代商战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迪。

如果说，儒家思想的精华，能够在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机制方面发挥一定作用的话，那么，中国兵法在谋略和组织等方面的思想结晶，完全可以用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组织和管理。无论是在宏观层次上制定并实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面，还是在微观层次上制定和实施企业商战策略方面，中国兵法的精华都可以算得上一部完备的教科书。

因此，从完整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角度看，我们所进行的

企业文化建设，不仅要吸收儒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还要吸收那些长期处于非主流的其他派别的思想精华，例如，法家的法治精神，墨家的科学求实精神等。其中，中国兵法所体现的科学决策和组织管理思想，更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兵法应该而且必须作为现代企业文化的传统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节 兵法经营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 企业管理的探索

追溯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发展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与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沿革相同步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这一体制的形成初期，我国就开始构建企业管理模式。可以说，当时建立起来的企业管理模式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企业内的延伸和复制。企业管理以生产为中心，企业的发展取决于国家的计划，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市场竞争和经营策略的选择。与低效率的体制相伴共生、互为因果的企业生产要素配置的低效率，是这一时期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扩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趋于松动和解体的过程中，市场化因素逐步长入企业管理，使企业由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则把我国企业管理推向建立与市场主体相适应的功能结构的新阶段。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管理发展的过程，其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相比，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突出地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管理思想上逐步树立了面向市场、开拓进取的竞争观念；二是在管理理论上，

形成了全要素整体优化配置的理论体系；三是在管理方法上，建立了“软”“硬”结合的方法体系。这些变化使传统体制对我国企业管理的影响趋于弱化，初步形成了现代企业的组织管理特征。

从现代企业组织管理的文化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管理的变革，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如何实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组织和行为规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有机结合、和谐统一，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的探索。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是我国企业管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对外封闭。虽然当时也创造出了足以彪炳史册的“大庆经验”、“鞍钢宪法”等管理模式，这些管理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却由于落后于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进程，因而不能从整体上改变旧体制僵化、低效率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逐步汇入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新潮流。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在一些企业中曾经产生了对“欧风美雨”的迷信，但相当一部分有远见、有作为的企业家则认识到，如果脱离了中国的国情，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即使引进了“现代管理十八法”，这“十八般武艺”也难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在一些人将源于西方文明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奉为圭臬的同时，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却兴起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这些具有高度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国家，对研究、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精髓所表现的浓厚兴趣，及其成功的实践，至少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他们既然能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推进现代工业文明的因素，我们就更应该寻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融于现代工业文明，成为促进现代工业文明成长的内生因素的有效途径，这正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的基点。

我们认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正确的途径应该是吸收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精华，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在这里，应该注意防止和纠正前述的两类偏颇，真正作到对国外的东西不迷信、不盲从，对中华传统文化不偏废、不泥古，创建出把现代工业文明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的管理风格、管理特色。而在这方面，建立兵法经营论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就是一个积极的探索。

所谓兵法经营论，就是运用军事谋略和组织管理理论及方法进行企业经营与管理。这里的兵法，从广义上说，就是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从狭义上说，则指中国古代兵法。

前面的有关论述，实际上也揭示了兵法经营论的经济及社会文化背景。兵法经营的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而且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远在春秋时期，象管仲、范蠡这样的军事家，不但以奇谋大略辅佐国君取得了霸权，而且还在商业上取得了辉煌成就。管仲使齐国获渔盐之利而富强，陶朱公范蠡弃官经商之后，以富甲一方而声名显赫，被后世商人尊为祖师。在近代，清朝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也基本上是历经征战的将帅。曾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同时也是西北和甘肃近代纺织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奠基者。由此可见，兵法经营在中国是一个把军事文化与商业文化结合起来的歷史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们党在推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并且取得了伟大的建设成就。例如：“一五”时期的 156 项重点建设工程和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大庆石油会战的成功，就是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用于建设实践的范例；在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形成的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和政治思想工作等克敌制胜的法宝，转化为我们企业管理的优良传统，至今仍然显示着强大的威力，成为新时期我国企

业优势的基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面对波诡云谲的市场，决定企业命运和前途的是自身的综合竞争能力，是对市场风云变幻的洞察能力和反应能力，是蕴藏于文化这一深层的企业价值观和精神所凝聚的原动力。而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兵法所蕴含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管理方法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姑且不论其他，即从 70 年代以来国际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兵法经营论这一命题的确定，也顺应了现代商战中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发展的需要。

因此，无论是从历史渊源，还是从现实的需要来看，兵法经营论都存在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理论及实践基础。沿着中国兵法的思想体系的脉络，兵法经营论体系包括这样几个主要方面：

一是制定企业经营战略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在这方面，《孙子兵法》中的“庙算”、“经五事”、“校七计”所揭示的思想和方法，在今天完全可以用于企业环境分析和企业素质的诊断，以确定企业的经营战略。

二是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中国兵法历来强调审时度势，随机制宜，因时变化，动态决策。《孙子兵法》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对现代企业来说，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增强自身适应性和提高应变能力是在竞争中获胜的重要条件。

三是提高竞争能力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孙子兵法》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现代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须树立主动进取的开拓精神，在与对手竞争时，要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在这方面，著名的“田忌赛马”已成为现代对策论的经典案例，也能够为现代企业在竞争中避实就虚，以弱胜强，提供有益的借鉴。

四是提高决策者、指挥者素质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领导者的素

质是现代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孙子兵法》在“校七计”中所说的“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就是指领导者的政治素质和决策、指挥才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是中国兵家的至理名言。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领导者的素质时引用孔子的话指出：“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是领导者品质的优劣对其成员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其他如领导者要求贤若渴，知人善任，集思广益等，在中国兵法中更是不绝于书。

五是全面培育企业优势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现代企业的综合实力既取决于企业的人的素质的高低、资金的多寡、技术的优劣，也取决于对这些生产要素的合理组织与优化配置。对于优势的培育，中国兵法谓之“造势”。对于人，要解决“赏罚孰明”的问题，以形成对其行为的有效激励和约束；对于技术，则要明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组织和管理，必须建立完善的组织制度，而对企业的无形竞争，必须以“武为表，文为里”（《尉缭子·兵令》）；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子兵法·图国》）即以政治信念和价值观为核心，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对于浩繁的市场信息，则要“先知”、“知敌之情”，如此才能“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等。

以上几个方面，虽然不是兵法经营论的思想和方法的全部内容，但也勾画出了把兵法的理论和方法用于现代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主要方面。即使从这些方面看，中国兵法也能够与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实现高度的契合。作为一种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密切联系，有机结合，并且属于高层次文化形态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兵法经营在国内外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中已经和正在取得成功，从而也证明，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然，源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兵法，也必然存在着糟粕；军事组织和企业的经营管理，也有着异质性。因此建立兵法经营论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既不能对中国兵法不分良莠地兼收并蓄，也不能把军事理论

照搬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或进行简单的类比，这些方面，正是需要认真探索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一章 中国兵法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

在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华文化宝库中，有一颗绚丽多彩的明珠，那就是中国兵法。凡是较为认真地钻研过中国兵法的人，无不对它蕴含的深刻哲理、高度智慧和各种各样行之有效且又高深莫测的谋略赞叹不已。千百年来，无数人从中国兵法中汲取过营养，由此取得事业成功的事例比比皆是。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各地的一些企业家开风气之先，将中国兵法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从而使中国兵法的内在价值得到进一步展示。这是中国兵法运用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也是企业经营管理发展史上的一项极富开创意义的探索。

随着兵法经营实践的发展，兵法经营论作为一种高层次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目前在中国已为企业界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为了使兵法经营论继续健康发展，我们除了应该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外，还需要在理论上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即系统研究中国兵法，把握中国兵法的主要内涵，发现中国兵法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共性，使中国兵法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结合不断扩展和深化。

第一节 从孙子到毛泽东：中国兵法的历史进程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中国兵法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即由兵法思想的最初萌生到《孙子兵法》问世为中国兵法的形成期；由《孙子兵法》问世至“武经七书”颁定为中国兵法体系的确立期；从“武经七书”颁定至民国初年为中国兵法的丰富发展期；从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确立开始中国兵法进入全面创新期。4个时期各具特色，一脉相承，显示出中国兵法发展史的基本轮廓。

一、中国兵法的形成

兵法的产生无疑与战争有密切关系。战争是兵法的源泉，没有战争便无从总结战争经验。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是敌对势力间最激烈的对抗行为，所以战争又是激发人们智慧、促使兵法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应该看到，战争并非是产生兵法的全部理由。除战争外，兵法的产生还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有千丝万缕联系。离开这一背景，兵法的产生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经济、文化在历史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中国的战争史几乎可以追溯到与文明史同样久远，在战争的规模、频繁、激烈、残酷程度上不亚于其它任何国家。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中国从很早的时候便产生了兵法。

早期的中国兵法散见于各种历史文献中。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著述几乎无不言及谋攻庙算、诡道用奇、应变用间等兵家之事。其后这些兵法经过有心人的集中、整理、概括和深化，并形成专门性文字，便成为兵书。兵书是兵法的载体。兵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兵法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中国兵法体系的确立

目前已知的、有记载的中国最早兵书为《军志》。可惜此书早已亡佚，我们只能从其它文献的转录中略窥其一斑。现存最古老的兵书为《孙子兵法》。此书大致成于春秋末期。从此时直至宋神宗元丰年间下令校定‘武经七书’，中国兵法的发展以确立体系为主要特征。这一时期问世的兵书主要有：

（一）《孙子兵法》

孙子名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史载其事迹较简略，主要有孙武因齐国内乱出奔吴国，“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尽观孙子十三篇

后又通过孙武以宫女“小试勒兵”于是“知孙子能用兵 卒以为将。西破强楚 入郢 北威齐晋 显名诸侯 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孙子兵法》现存本分为 13 篇，各篇论述内容大致如下：

始计篇—预测战争胜负的依据。

作战篇—速战思想。

谋攻篇—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

军形篇—战争形式的变化与选择。

兵势篇—交战态势。

虚实篇—掌握主动，以实击虚。

军争篇—争胜法则。

九变篇—九种作战方针。

行军篇—作战时机的选择和侦知敌情之法。

地形篇—占据地利。

九地篇—与战地形态相应的战斗法。

火攻篇—火攻方法。

用间篇—使用“间谍”收集情报。

《孙子兵法》包罗宏富，在总结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因此，历代军事家对该书都推崇备至，尊之为兵经之首。此后中国的兵学著作无不祖述孙子。该书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军事科学领域有很大影响。

(二)《司马法》

《司马法》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有争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 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本姓田 春秋末期齐国人 齐景公时为齐将 治军严整，执法不阿，屡立战功，被封为大司马，后人尊称为司马穰苴。《司马法》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称《军礼司马法》155 篇 但由于年代久远 亡佚严重 现存《司马法》只有 3 卷 5 篇。该书文字古朴，

推测可能有部分内容在司马穰苴之前即存在，有可能亦早于《孙子兵法》。内容上该书论述范围与《孙子兵法》大致相同但在军队编制和多兵种协同作战方面文字较多，具有特色。其中几处谈及骑兵，又说明至少有部分内容是战国甚至秦汉时期补入的。结合以上几种情况，现存《司马法》应该出自多人之手，其成书过程也应经历了较长时期。

（三）《吴子兵法》

《吴子兵法》亦称《吴起兵法》后又称《吴子》相传为吴起所著。吴起 卫国人 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 先后在鲁国、魏国、楚国为将为官 战功卓著 政绩斐然。作为政治家与商鞅齐名 作为军事家与孙武并称。《吴子兵法》在战国、西汉时期广为流传。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境内皆言兵 藏孙吴之术者家有之。”但此书亡佚亦严重，《汉书·艺文志》记有“吴起四十八篇”而今存本只有 6 篇。郭沫若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说：“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观之 大率西汉中叶人所依托”。尽管如此 该书仍不失为一部价值较高的兵书。

（四）《孙臆兵法》

《孙臆兵法》亦称《齐孙子》战国中期齐人孙臆及其后学所著。孙臆为孙武后代 曾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仕魏 以为“能不及孙臆”故暗召孙臆入魏“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后孙臆返齐“威王问兵法 遂以为师”。此后孙臆用计 数败魏军 杀庞涓 名显天下。《孙臆兵法》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 89 篇 图 4 卷，但不知何故后来失传。1972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重新发现此书，但比《汉书·艺文志》所载少了许多，只有上下两编各 15 篇 无图。

（五）《尉繚子》

《尉繚子》也是一部争议很多的兵书。关于该书的作者 有人认为是梁惠王时的尉繚，但由于史书中并无梁惠王时尉繚的记载，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却载有大梁人尉繚游说秦始皇被任为国尉事，因此又有人认为该书的作者为秦始皇时的尉繚。《尉繚子》在《汉书·艺文